

卡翁达自传

赞比亚必将获得自由

卡 翁 达 自 传

赞比亚必将获得自由

〔赞比亚〕肯尼思·戴·卡翁达著

伍 群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Kenneth D. Kaunda

ZAMBIA SHALL BE FREE

An Autobiography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LONDON IBADAN NAIROBI

根据伦敦、伊巴丹、内罗毕海涅曼教育图书出版公司

1971年重印版译出(初版于1962年)

卡 翁 达 自 传

〔原书名〕赞比亚必将获得自由

〔赞比亚〕肯尼思·戴·卡翁达著

伍 群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25 字数 118,000

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149 定价: 0.47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现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的自传，写于1962年。当时，赞比亚尚未独立，仍是英国的“保护地”北罗得西亚，为英国于1953年9月强行拼凑而成的“中非联邦”的一部分。由于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现称马拉维共和国）三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英国殖民者被迫于1963年12月31日宣布解散“中非联邦”。北罗得西亚于1964年10月24日宣告独立，更名为赞比亚共和国，卡翁达任总统。作者在本书中叙述了自己的家庭、童年生活、所受的教育以及与殖民主义作斗争、争取赞比亚独立的政治活动的经历，并阐述了自己的一些思想政治观点。

由于译者水平的限制，译文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指正。

1975年3月

前 言

我认识卡翁达先生已有多年了。前些日子，他向人介绍我时说：“这位是斯图尔特·戈尔-布朗爵士，他在非洲生活的时间比我还长。”

五十年前我初次到北罗得西亚，在席瓦恩甘杜住了四十年。这里是我和我儿孙们的家。我代表非洲人的利益，在北罗得西亚立法机关工作了将近十五年，这个工作使我必须在全国到处旅行。卡翁达先生和我一直是朋友，所以如果我写的能对他有所帮助，我是很乐意这样做的。

我已读过他这本书，这本书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现在可以恰当地说，这本书也表达了北罗得西亚绝大多数明智的人——不但非洲人，而且还有欧洲人——的感情。

斯图尔特·戈尔-布朗

1962年5月于伦敦

目 录

前言	1
一 在卢布瓦的童年	1
二 在穆纳利的学校生活	8
三 教师	14
四 我的流浪时期	19
五 种族隔离	26
六 我决定回家	31
七 哈里·恩坎布拉作为领导人	40
八 北方省的组织书记	46
九 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	49
一〇 挫折时期	53
一一 非洲人的意见	63
一二 访问联合王国	72
一三 我和哈里·恩坎布拉决裂	80
一四 被捕和监禁	95
一五 狱中	112
一六 联合民族独立党和教会	128
一七 决定胜利的一年	142
附录一 历史的简述	151
附录二 关于在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以及 在北罗得西亚选举非洲人和其他种族	

	代表的方法的备忘录(1952 年).....	157
附录三	对修改北罗得西亚宪法建议的评论 (1958 年)	167
附录四	关于格温贝山谷骚乱的报告, 1953 年 12 月 14 日送交非洲人国民大会	178

一 在卢布瓦的童年

我的父母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布希兹亚，意思是“不速之客”，因为我是在他们结婚二十年时生的，在儿女中排行第八，其中三个在幼小的时候就死了。我于1924年生于卢布瓦，在卢安瓜河和钱贝西河这两条大河的流域间的山区。我的父亲戴维·卡翁达是1904年由尼亚萨兰的利文斯敦尼亚教会派到北罗得西亚说班巴语的钦萨利区的第一个非洲人牧师。他和我的母亲在班巴人中作信仰上帝的见证有好多年，获得酋长和人民的信任。卢布瓦传教站距钦萨利八哩，直到传教先驱者麦克明先生来和他一起传教时才建立。

我八岁时，父亲死了。当我听到他的死讯时，我哭得很厉害，因为我爱他，对他的回忆全都是美好的。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总是指望别人无条件服从。他在家中管教我们很严格，但是只打过我一次。我相信，直到我死，我也不会忘记父亲这次打我的情况。我挨打后痛了好几天，他只得给我敷一些镇痛药。对于一个非暴力主义的鼓吹者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有启发意义的值得谈的故事；但也许正是父亲早年给我的这个教训，使我懂得了不要以武力对待同胞兄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现在已记不得那次争吵是怎么回事。我只记得，有件事情使我对卢布瓦一个教师的小儿子很生气。他和我年龄一样大，这是我

生平第一次去找他，我一下子就把他打翻在地，骑在他身上，拳头象雨点般落在他头上。幸好我的父亲走过，看见我在痛打他同事的儿子。这就是这场打架的结束，也就是我挨打的原因。父亲每次给我敷药时，他就反复地往我这个幼稚的头脑中灌输打架是罪恶的思想。在我一生中，另外还只有两次我采用了暴力的手段，但我必须把这些故事留在我传记的后面几章来叙述。

我的父亲当了好多年校长，但到晚年，他被任命为教会的牧师。这个职责就是要他经常在农村中巡回，访问人民。我对他最亲切的回忆，就是关于他出发巡回前全家团聚的情景。他把母亲和我的哥哥姐姐们叫到一起，我们唱几首赞美诗，他和我们一起祈祷。我是多么喜欢和他一起唱啊！说真的，母亲经常告诉我，说我很小的时候，在这种场合，我会站起来模仿他打拍子。用我的本族语——柔和的班巴语唱的、曲调优美的赞美诗，使我开始爱上了唱歌，而且以后一直喜欢唱。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好的传道者，虽然我记不得他的布道内容，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在布道开始之前，我们就总是从教堂里出来了。我想，有时候他的讲道一定使那些传教士们不高兴，因为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个星期日做完早礼拜后，我在父亲屋外的沙地上玩，发觉父亲同麦克明先生、马克斯韦尔·罗伯逊牧师和布朗医生一起坐在走廊里的桌旁讨论什么事情。突然，我被砰的一响吓了一跳，往四面一望，看见正是我父亲在拍桌子；他已经跳起身来，正在和传教士们热烈地争论。

卢布瓦座落在北罗得西亚北方省内钦萨利美丽的群

山中，是一个很好的居住地。年老的麦克明先生(我们管他叫希库卢——“爷爷”)、我的父亲和其他传教士，从建立起一个有秩序的、和平的繁忙社会，我回顾起来怀着深厚的感激之情，体会到我该多么感谢我早年在那个地方受到的培养。虽然我们家里只有五个孩子，可是我记得，坐在一起吃饭的从来不只是我们这几个人。我们家里总是有许许多多客人和来访者。在学期期间，总有许多孩子——我父亲朋友们的儿子，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付不出学费，我父母出于仁慈收容了他们。现在，童年的一个情景又出现在我眼前，我看见桌上已摆好了几碗饭菜，准备吃饭，当客人们聚集拢来时，他们被附近森林中的咆哮声吓了一跳。有人笑着说，这是一个出名恶作剧的人敲出一种鼓音模仿狮子的吼声，但是，突然，这吼叫声越来越近，没有人会再把它误会作别的什么声音了，这的确确实是狮子的吼叫。每个人都惊慌起来。我的哥哥一把抓住我的手，我被拖着走，简直脚不着地飞奔着，我的哥哥是多么急切地要把我带到邻居屋里的安全地方。

假若我的父母不开辟出一些大园子种吃的东西，单靠我父亲当牧师的微薄薪水，是决不能在我们家里款待这么多客人和来访者的。我母亲自己做肥皂，送给那些帮我们垦地锄草的人。在十哩外的河床里，他们种了水稻；离卢布瓦不远，他们耕种了大片土地。他们的殷勤好客出了名，人们普遍地把他们的家叫做加利利——和平和休息的地方。北方省的土地是非常贫瘠的，任何农作物要获得收成，只有用火耕法。在旱季，人们拿了斧头跑

到森林中去，爬上树去砍树枝。他们把这些树枝堆成一个个大堆，在雨季前烧掉。在北罗得西亚，班巴族人爬树是最内行的，把这些树枝在烧前堆积起来的方法也要有很高的技术，如果这些树枝不是慢慢地烧，并且完全烧光，那么火底下的土地里杂草仍然没有根除，当种子播种在木灰里，杂草就会丛生，使玉米枯萎。人们发现，只有用这个办法才有可能从土地上获得收成。北方省并不缺少可耕种的土地，因此我们只是修剪树枝而不是把树砍死。过几年，未开垦的土地经过改造后，又可以耕种了。我国人民经过长期的不断摸索，懂得了怎样在自然界中生活，如何在贫瘠的土地上生存下去。

父亲死后，母亲指望她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一起帮助她治家。虽然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不得不在屋里和园中干各种活儿。我学会了到两哩路外的井中去运水——决不准许我们因为缺水的缘故而用任何借口不洗澡——母亲坚持要我们天天脱去衣服洗澡。我学会了跪在石磨旁推磨，为每天的晚餐磨玉米。我学会了刷洗锅子，洗烫自己的衣服。我们要到树林中去拾柴，老是要去搬木材回来做粮食箱，搭鸡棚。

父亲曾打算要我受到尽可能最好的教育，这在当时只有到南非去才能办到。他计划当我一受完基础教育，就把我送去和 Z·K·马修斯一起生活，但是，当然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教小孩子的办法是，把他们聚集在树下，树上挂一块布，上面画着字母。我记得很清楚，坐在树荫下好几个小时，单调地念着“a-e-i-o-u”，然后用手指在沙地上写字。我们在坐着的地方

近旁弄平一小块地，教师在我们孩子中间来回走着，纠正我们所写的字。每一块布都叫作“纳萨卢”，当我们念完“纳萨卢”一、二和三时，就升到一年级，就获准用石板了。当时普及教育还不是免费的，每个孩子的父母必须每年付费半克朗。恰在我父亲死前，我得了流行性感冒，因此不能在开学时上学。当我终于到学校去报到时，教师向我索取两先令六便士，我告诉他我没钱，他就叫我回去向母亲要必须付的半克朗。我哭着跑到母亲那里，但是家里没有钱，她和我一起哭。幸好一个好心的邻居帮了我们，借给我们钱，以后我们在适当时候还了他。在那时，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就可使一个孩子永远丧失他一生中受教育的权利。

当我终于升到中学读三、四、五、六年级时，我每年必须付学费三十先令。母亲把园里种出来的东西供给我吃，还要设法一点一滴地凑钱给我买衣服。但是为了要付学费，每逢假期我就得去找工作做。承蒙教会雇用我给学校花园挖排水沟，并在那里附近干些杂活，每月给我十先令。每年有三个月我用这样的方法得到了学费。这使我后来当教师时，看到一些学生不得不为了学费而奋斗，心中就非常同情。这使我在小时候就懂得了自助非常重要；这也导致我在木富利腊学生中组织自助会，这我将在另外一章中叙述。

我九岁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开始走上爱好器乐的道路，它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乐趣之一。我哥哥的一个欧非混血种朋友，从利文斯敦尼亚来探望我们。他随身带来了一架有二十一根弦、三小节的古琴。他教我哥哥

弹奏古琴，当他离去时就把它卖给了我哥哥。没多久，我就说服了哥哥教我如何弹奏这乐器，它是我闲暇时的忠实伴侣。我们演奏矿工们从镇上带回来的乐曲；这些都是西方舞曲，但我们给它配上了自己的节奏，当然，不久我就开始创作我自己的咏叹调和小歌曲。我想，在一天辛苦工作之后，悠闲地在星星和月光下弹琴，朋友和伴侣们尽情地跳着舞，这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休息了。我当教师后，就买了一只吉他。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得了非常厉害的腿痛和头痛病。我还经常害疟疾。我是医院中出名的病人之一，每天要到那里去治疗两次。如果没有教会里的布朗医生和护士悉心看护，我今天是不能在这里写这本书的。就在这个医院里，我初次遇见了一个叫西蒙·卡普韦普韦的男孩，他后来成为我忠诚可靠的朋友，现在跟我在一起，是联合民族独立党的总司库。虽然我有腿痛毛病，但我热爱踢足球。我们的校长马克斯韦尔·罗伯逊牧师把整个学校按不同村子组成各个球队，我当然参加加利利队。我们很小就开始踢球，先踢网球，没多久就允许我们踢真正的足球了。

正是这样的一次足球赛引起我第二次卷入了打架。我们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赢了另一个村的足球队，但他们不服输，赛后他们向我们挑战要打架。那个足球队里的男孩比我们加利利队任何一个队员都大得多，他们选派了一个最大的人，就象从非利士来的巨人歌利亚^①

① 《旧约·撒母耳记》中记载的歌利亚，是个巨人。——译者

一样，向我们球队中的一个人挑战。我们球队中最大的一个男孩赛后身体很不舒服，不能迎战；我们指派的下一个人，他又不肯面对这严峻的考验，于是这个命运就落到了我的头上。除了我早先和教师的儿子打架以外，我从来没在打架上下过什么功夫，但是我感到我必须尽全力去干。没多久，那个孩子就把我打翻在地上。我朝天躺在地上，他象一头水牛那样向我猛扑过来，但是我向他的胃部猛踢一脚，使他向后跌倒，我马上爬起来，终于得胜地骑在他身上。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口袋里有一把小刀，他拔出小刀在我的头皮上到处乱划。观众们一看见鲜血就吓跑了，我便设法脱身。我对自己所受的区区皮毛之伤一点也不在乎，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去见我的母亲，因为我的白衬衫上染满了鲜血。我脱下衬衫，把它用泥擦过，直擦得它脏得看不出血迹。当母亲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我大概对她撒了谎，说这是一次非常粗野而肮脏的球赛。我相信，直到今天她还不知道我曾为了维护自己球队的荣誉，奋不顾身地打过架。

二 在穆纳利的学校生活

我们很幸运的是，能有象马克斯韦尔·罗伯逊这样充满着活力和魄力的人当校长，他做一切事情，都能够得到最大的实效。纪律是严格的，不准任何孩子偷懒。他是北罗得西亚童子军运动的创建者，虽然那时我们自称为“开路者”。学校中大多数孩子都参加了这个或那个童子军队伍，马克斯韦尔·罗伯逊有意识地培养童子军精神和对队伍的忠诚，以打破我们的种族对抗思想。不论在智力、体力或精神方面，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没有被忽视。那时，我脑子里想的是，决心要继承父业，做一个教会牧师。我感到母亲老早就在我面前坚持这个理想。要当牧师，正规的道路就是首先当教师为教会服务。因此当我读完六年级时，几乎理所当然地，就被卢布瓦教师正规训练班接纳进去了。

我在教师正规训练班受了两年多教育，那里的生活和我的学生生活没有什么区别。由于生活在教会中，我很小就上学了，所以我是培训的教师中最年青者之一。在那段时期，我没有什么突出的回忆，除了有一次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罢课。前一批学生在一年内完成了训练，而我们的课程却预定要学两年。为了某些理由，我们头脑里就产生了一种思想，认为对待我们不公平，我们就罢课抗议。我记得，并没把这事看得很严重，因为我们卷起铺盖

跑回家去三、四天后，又一个个地溜回学校，而我们又被收为学生，甚至不用我们赔不是。

1940年8月，第一所中学在卢萨卡的穆纳利开办了。1941年，我和其他二十九个学生一起，从全地区范围的各学校中挑选出来，到穆纳利读一年级。我有生以来，几乎没有踏出过自己的家乡钦萨利区，而现在我要长途跋涉到城里去了。这是我第一次乘卡车长途旅行，我们差一点发生严重事故。在离开卢布瓦的第二天，卡车司机由于前一天整日狂饮，对卡车失去了控制。在我们这地区有许多大蚁丘，我们通过从一个大蚁丘中挖出来的一条路，路很狭，两边都有很高的土堆，幸好我们的卡车刚好穿得过。卡车撞在一边土堆上，又转变方向，横过道路，撞上另一边土堆，于是在尘土弥漫中停住了。我们全都吓得发抖，但这次撞车使司机神志清醒了，我们继续赶路。到了姆皮卡，我们发觉和另一辆往南去的卡车失去了联系，因此我们不得不空等四天，无事可做。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到达卡皮里姆波希的情景。我那时只有十七岁，从来没见过火车。我不知道自己在期望什么，可是当我们跑到铁路上，我的确是在观望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我旅行了好几天，一直没有机会好好地洗个澡，我渴望着能洗一次澡。我自幼起，早已养成了每天独自洗澡的习惯。现在，我被带到一个公共澡堂，脏得难以形容。我徘徊了几个小时，试图鼓起勇气进去，我抱着一线希望，总会有我可以单独洗澡的时候。厕所也是那么令人作呕，我简直走不进去使用。我初次到达卡皮里所受到的震惊，使我好几天才恢复过来，而现在每当

想起它时，我仍不寒而栗。

经过八天令人厌倦的旅程后，一到达穆纳利，我发觉自己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我第一次看到实验室，我们开始学习一些真正的科学。开始，我上生物课时完全感到莫明其妙，但不久我对这门学科着迷了。我一直学不好数学，可是在穆纳利有一个好教师，不久我就不怕这门学科了，因此期末考试时，我在班级中名列第二。历史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学科，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我没有学好，也许是因为我们要读的全是南非史。英国文学这门学科，我终于爱上了，但是期终语法考卷上，我的成绩很差。

我们在穆纳利的生活是丰富多采而饶有趣味的。决不是整天只关在教室内工作和学习。我马上参加了足球队，我们和当地球队作了许多次紧张的和有几次是很粗野的比赛。我的脚上至今还留着一个大伤疤，是被卢萨卡一个“老虎”踢伤的。校方非常重视体育，我代表我的宿舍参加一哩和半哩赛跑。在我二年级时，我率领我宿舍的人在宿舍与宿舍之间的运动竞赛中获胜，虽然由于我在一哩赛跑中的成绩几乎使我的宿舍失去了得奖杯的机会。我在第一、第二圈中是领先的，但是我一定起步太快，因为不久我就远远落在后面了。虽然我跑在最后，但是我顽强地坚持跑下去，因此当我从约翰·沃丁顿爵士手中获得宿舍奖品时，他称赞我一直跑到终点。我感到很高兴，我第一次与英王在我国的最高代表相见是非常愉快的。但并不是我与总督们所有的相见都是如此幸运的，这将在我的经历中证明。

学校里有许多低年级同学被高年级同学欺侮的事